

南宋官窑文集

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

文物出版社

南東府密文集

南宋官窑文集

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 编

文物出版社

北京·2004

序

在进入光辉灿烂的新世纪之际，南宋官窑博物馆为了活跃学术气氛，更加深入地研究南宋官窑，决定编辑出版《南宋官窑文集》。这个学术活动得到耿宝昌、李家治、朱清时、蔡和璧、张浦生等著名古陶瓷学者热情的支持，在百忙中撰写论文，集其大成，甚为欣慰。

南宋官窑闻名世界，它的制瓷工艺和瓷器质量在宋代瓷窑中是最好和最珍贵的，所以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本文集的26篇文章，是作者经过对大量考古发掘资料、古代文献和微量元素、化学分析等的研究而写成的。多数学者认为：南宋官窑先有“内窑”，后有“郊坛下”。内窑也叫修内司窑，窑址在杭州凤凰山老虎洞，人们常用地名命名古代瓷窑，所以亦称“老虎洞窑”。老虎洞窑的制瓷历史较长，在南宋和元代都在生产，其中南宋又分上下二层，说明郊坛下官窑建立以后，老虎洞窑没有停烧，还在继续生产。

公元1126年的靖康之变，北宋徽钦二帝及宫廷中的仪器法物和日常生活用具被金兵席卷而去，高宗赵构接位，建立南宋。在金兵的追击下，高宗先后驻蹕南京（今河南商丘）、扬州、杭州、建康（今江苏南京）、绍兴、平江（今江苏苏州）、临安（建炎三年七月将杭州升为临安府）等地，至绍兴八年（1138）始定都临安。在修内司官窑建立以前南宋宫廷需用的祭器和日用瓷由慈溪市古银锭湖低岭头、寺龙口、开刀山、张家地等瓷窑生产，瓷器具有河南宝丰清凉寺汝窑御用瓷的特征，很可能有汝窑和北宋官窑的窑工参加了生产。宋赵子直在《中兴礼书》卷五九《明堂祭器》中记载了绍兴元年（1131）、绍兴四年（1134）朝廷分别命越窑和绍兴府余姚县烧造明堂祭器的事证明南宋初年这些瓷窑的产品是供皇宫用的，修内司官窑建立后这些瓷窑就停烧了。修内司、郊坛下官窑早期的产品、窑具、制瓷工艺也受汝窑、北宋官窑的影响，所以从寺龙口、低岭头到修内司、郊坛下的瓷器，可以看到南宋宫廷用瓷的全貌及其发展演变过程。同时老虎洞南宋层出土的瓷片已经拼对了1000多件瓷器，大大地增加了南宋官窑的光彩，也使南宋官窑博物馆增添了珍贵稀有的陈列品。

论文中对修内司、郊坛下的开窑时间，老虎洞南宋下层是否是修内司窑等问题还有不同的认识，同时对在杭州是否还有官窑等提了意见，这有利于官窑的进一步研究。

南宋官窑的研究是中国古陶瓷研究中的一项令人瞩目的重要课题。愿古陶瓷界同仁共同努力，不断推动相关研究工作的深化和学术领域的繁荣。

朱伯谦

PREFACE

At the time of entering the new century,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Guan Kiln Museum compiled this book *A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Southern Song Dynasty Guan Kiln*. I am glad that some famous scholars, such as Geng Baochang, Li Jiazhi, Zhu Qingshi, Cai Hebi, Zhang Pusheng, and others, have supported this book.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Guan Kiln is world-famous. Its quality was the best and the most precious in the Song Dynasty kilns. Therefore, the academic circle has alway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n them. The 26 articles in this book were written based on the tremendous research work done by the authors. Most of the authors think that as for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Guan Kiln, “Neiyao” (Inner Kiln) came into being first; “Jiaotaxia” appeared later on. Neiyao was also called Xiuneisi Kiln, and the kiln is located at Laohudong of Fenghuang Hill in Hangzhou. The ancient people usually name a kiln according to the name of that place, so that is also called “the Laohudong Kiln”. The Laohudong Kiln has a long history of porcelain making. It lasted for two dynasties, i. e. the Southern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he Southern Song layer can be divided into upper and lower layers. That explains that after Jiaotaxia Guan Kiln was established, the Laohudong Kiln did not stop producing.

In 1126,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collapsed. The last two emperors, Huizong and Qinzong, and many ritual wares were all looted by Jin troops. Gaozong ascended throne and established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Chasing by the Jin troops, Gaozong moved the capital to Shangqiu, Yangzhou, Hangzhou, Jiankang, Shaoxing, Pingjiang, and Lin’an. In 1138, the capital was settled in Lin’an. Before Xiuneisi Kiln was established, the daily and ritual porcelain wares used by the Southern Song court were all made by Dilingtou, Silongkou, Kaidaoshan, and Zhangjiadi around the old Yindin Lake at Cixi county. Those porcelain wares that ha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mperial porcelain wares were produced in Qingliangsi Ru Kiln in Baofeng, Henan province. It was very likely that the craftsmen from Ru Kiln and Northern Song Guan Kiln participated in the production. Zhao Zizhi, a Song

Dynasty scholar, recorded in his book *Zhongxing Lishu* that in 1131 and 1134, the imperial court ordered the Yue Kiln at Yuyao County to fire ritual wares for the use of the imperial palace. After the Xuineisi Kiln was put into production, these kilns stopped their production. The products, firing tools, and techniques in the early periods of Guan Kilns at Xuineisi and Jiaotaxia were influenced by Ru Kiln and Northern Song Guan Kiln. We can see the evolution of the porcelain used by the Southern Song court through the porcelain wares from Silongkou, Dilingtou, Xuineisi and Jiaotaxia. At the same time, over 1000 pieces of porcelain wares had been pieced up by the fragments unearthed from the Southern Song layer at Laohudong Kiln. Those cast lights o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Guan Kiln and enriched the exhibits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Guan Kiln Museum.

These essays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on the starting time of Xuineisi and Jiaotaxia Kilns, and whether the lower layer of the Southern Song period at Laohudong belongs to Xuineisi Kiln. Some scholars raised the question that whether there are still more imperial kilns in Hangzhou. That is good for further study on Guan Kiln.

The study o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Guan Kiln is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study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eramics. I hope that the scholars in this field can make common efforts to push the research work deeper and have more academic results.

Zhu Boqian

目 录

| | |
|----------------------------------|--|
| 序 | 朱伯谦 (I) |
| 南宋皇室官家祭祀与官窑器 | 蔡和璧 (1) |
| 刍议宋官窑青瓷 | 耿宝昌 (14) |
| 郊坛下官窑的新思考 | 吴晓力 (18) |
| 南宋官窑探微 | 邓禾颖 (24) |
| 论老虎洞窑的几个问题 | 李知宴 (32) |
| 杭州老虎洞南宋修内司窑发现的启示 | 陈元甫 (40) |
| 关于修内司官窑问题的思考 | 郑建华 (48) |
| 古瓷三笔 | 李 刚 (68) |
| 低岭头类型再认识 | 沈岳明 (79) |
| 说“制样须索” | 郑嘉励 (88) |
| 哥窑及相关问题 | 蔡乃武 (98) |
| 南宋官窑与龙泉窑的关系 | 李德金 (110) |
| 从汝官窑到郊坛官窑的传递 | 刘 毅 (123) |
| 两宋官窑有关问题研究 | 陆明华 (140) |
| 北宋汝窑、官窑与南宋官窑 | 赵文军 赵青云 (162) |
| 南宋郊坛下官窑与老虎洞官窑的比较研究 | 唐俊杰 (168) |
| 老虎洞窑瓷片堆积坑出土瓷器制烧工艺初探 | 张玉兰 (200) |
| 南宋官窑刻款瓷器研究浅见 | 金志伟 胡云法 (208) |
| 浅析苏、沪、皖地区墓葬、窖藏出土的“官哥窑”器之产地 | 张浦生 邓禾颖 (215) |
| 试论明清仿宋官窑瓷器 | 吕成龙 (223) |
| 南宋官窑瓷鉴定的化学和物理学基础 | 朱清时 (238) |
| 老虎洞窑和汝官窑瓷微量元素的研究 | 李家治 邓泽群 吴 隽 杜正贤 马东峰 孙新民 郭木森 (257) |

-
- 郊坛下官窑与清凉寺汝窑所用原料的初步分析……………李国霞 赵维娟 李融武
吴晓力 姚桂芳 谢建忠 郭敏 高正耀 (264)
- 南宋郊坛官窑瓷器的原料产地和烧制技术的研究……………赵维娟 李融武 吴晓力
姚桂芳 李国霞 谢建忠 郭敏 高正耀 (270)
- 南宋官窑青瓷特征的形成机理……………朱学斌 (277)
- 依托南宋官窑博物馆构筑中国陶瓷文化村初论……………张振常 (283)

南宋皇室官家祭祀与官窑器

蔡和璧

绪 言

南宋官窑与南宋皇室是密不可分，虽然五代有“秘色”之禁，但宋朝并没见到类似的文字记载。清末陶书虽有“官窑，惟官家用之”，但这里所谓的“官窑”重点应是指明清时官窑烧造的器物或高品质的窑器，以一般“普通名词”视之，因此不及于此论。关于南宋官窑，以当代人记当代事的资料，则有南宋皇家子弟赵彦卫所撰写的《云麓漫钞》，其内记有“近临安亦自烧之”，此处并没有以“官窑”称之。另外《咸淳临安志》亦只记“青器窑”，属提举修内司，“设于雄武营山上圆坛左右”。至于《说郛》所录之《武林旧事》及《辍耕录》所录之《坦斋笔衡》亦记有官窑事，但录抄于元朝著书内。

在考古方面，由于考古工作人员的努力，发现了几处窑址。就所发现的南宋窑址来看，其范围止于浙江境内，如杭州及慈溪低岭头的寺龙口之官釉窑址。特别是在南宋首府临安（今杭州）现在已有两处南宋官窑址发现（其中老虎洞窑址发现有八思巴文垫饼）。杭州成为南宋首府之后，由元、明、清延续到现今都是一个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城市。因此地下所埋藏的文化资产也应包括各个时代的遗物。在南宋太庙御道即发现大量官窑瓷片，并已有正式报告。太庙之外，也有其他一些瓷片的发现。除了临安市城外，现今官窑瓷片在他省几乎无所发现。再者，在南宋或其后的墓葬中，至今还没发现可考据的南宋官窑标准器，使其不像定窑、龙泉窑等有确切可考据年代之物来佐证，这一点希望将来有所进展。就现今情况在“墓葬中没发现”，或是可以说，在当时，生产的用途是尊贵的；在其后，收藏的意念是珍贵的。

对于南宋官窑的研究大环境而言，传世品及考古发现所呈现的情况，必须同时考虑的问题有以下几点：

1. 在宋皇城周边，官釉窑址现在发现两处，已做科学性挖掘之对比。是否还有他处仍未发现？

2. 元朝的官釉生产与哥窑的关联性，在非仿造意思下，常态生产的情况如何？

3. 明朝的官釉有两种：1) 在景德镇生产的官釉，胎质与杭州的不同；2) 有意仿造的小窑个别作品。

4. 清朝御窑及好事者仿造宋官釉情形。

5. 龙泉官釉最好的情况到什么程度。

以北宋汝窑而言，据记载，当时因定窑瓷器有芒而命汝窑烧造。定窑、汝窑都是进御之窑。从考古挖掘中，知道了定窑有广大的窑场，形成一个定窑系，除了烧造贡瓷外，亦烧造一般高档商品。汝窑在文献中所记的为宫中命烧。在相关工作人员长期的努力下，终于在宝丰县清凉寺发现了属于北宋汝窑的窑址，在清凉寺遗址清理的范围内，有数座窑基的存在。最近又发现汝州市张公巷民宅地基下的一处窑址，此处窑址范围如何，有待日后的清理。此窑址的产品与清凉寺略有不同，但相当近似。另外宝丰县大营镇蛮子营村窖藏出土的47件碗盘，¹⁾与清凉寺的虽也略有不同，但亦相当近似。汝窑虽然不像定窑那样有广大的销售范围，而只限于官家指定烧造，但汝釉系烧造并非独家之作。由上述这几处窑址出土物的情形来看，烧造汝窑类型产品的并不止于一处。由此考虑，南宋官窑的情况又如何呢？由出土瓷片及故宫旧藏的南宋官窑器中，亦有常态生产的几种类型存在，这些实物的存在，向我们提出了很多需要探讨与解决的问题。

正如历代陶书中所评的，南宋官窑为顶级名窑之一。宋朝皇室非常重视祭祀，南宋官窑器诸多器形类似青铜礼祭器，祭祀的礼祭器含有尊贵与传承的一面。由于后代文人对于官窑的各种记载，使得嗜古的乾隆帝，将“官窑”尽其所能地收拢入宫。而这些清宫旧藏的“南宋官窑”器，大多数是清康、雍、乾三朝时陆续进宫的，特别是乾隆时期，乾隆帝将“各式各样”的“官窑”入藏宫中，因而使南宋官窑传世品绝大多数保存在清宫中。在今日，也给我们留下了珍贵与丰富的研究材料。

本文言及南宋官窑，首先，由宋室南下后各方面的动态及各项事务开展情形来探讨南宋皇室官家对于官窑器需求的情况。在挖掘出土的瓷片及传世品中，除了用于日常生活的碗盘之类器皿外，簋式炉、奩式炉、贯耳壶、波罗子、洗等诸多礼祭器造型占相当多的比例。宋朝非常重视祭祀，绍兴十一年（1141）与金议和之后，祭祀行仪逐渐完备。由于战乱之后，国政困难，因此绍兴十三年（1143）命祭器有“应用铜玉者，权以陶木”，这给予礼祭器制造一个明确的指示方向。现在将文献中与祭祀相关的事项，如国家祭典、皇室宗教信仰、皇室家族祭祀及皇族攒宫之寺庙等活动情形，统合来看其所需之礼祭器概略。当然，这里所指的礼祭器并非只指官窑瓷器而言，其中也应考虑到漆器等其他材质所扮演的角色。

一 南下的宋皇室，奔波的十年

宋朝高宗皇帝在靖康之难后，一路南下，建炎三年（1129）二月时，由扬州来到杭州²⁾，定杭州为行宫。由于整个政府机构迁移，又是军兴之时，一切从简就陋，虽然仍维持着国家的形态，但将很多机构合并简化，如寺监都省并，只留太常寺。未足两个月，在四月时军情不利，就转向建康（今南京），七月将杭州升为临安府。³⁾闰八月时有有意要留驻在建康，与大臣们讨论驻蹕之所，讨论的结果是东巡，⁴⁾于是闰八月又由建康出发。⁵⁾此时，与高宗另行的太庙艺祖以下的九室神位已奉迎至临安，⁶⁾而高宗则在十月时才抵达临安府。⁷⁾到临安并未久留，辗转又奔波于浙东、越州等地。⁸⁾绍兴元年（1131），感觉到越州、会稽的漕运不继，⁹⁾决定回临安。此时才命修内司在临安营建宫廷，并指示不得华饰。¹⁰⁾绍兴二年（1132）正月由绍兴抵达临安。¹¹⁾此为三度入临安，此后，才逐渐进行修建行在，皇城的南门是在当年九月才竣工。绍兴三年（1133），因为南方常雨，百官遇雨泥行非便，才建廊庑于南门之内。¹²⁾由这些情形看来，当时应是相当困难。

绍兴三年第三度入临安，在行政体系方面开始有些重要的措施，如置国子监、太学博士及监生以安置随驾南来的太学生。也设玉牒所宗寺，为跟随来江南的皇族系统加以登记，作为保护及管理皇族措施的根据。将作监也在此年设置，置丞二员，领监事，计料监造行在，并负责官司营房舍屋之类的营造事务。领事监、军事监、文思院一并在今年设置并置丞员。这些丞员的设置，一方面表示有人员来启动机构的营运，也同时开启了南宋在杭州的营运。¹³⁾

政府的基本机构规模经设定后，绍兴四年（1134）诏守臣梁汝嘉营造皇室继统象征所在的太庙，¹⁴⁾同年九月在梁汝嘉同修内司修建的礼殿举行祭拜祖先及诸神的仪式。所祭拜的神祇凡七百六十七位。如此戎马之时，隆重举行为民徼福及祭祖之大礼，除了表示逐渐安定，也表示在临安承续皇统与香火不熄。在此之前，“宫庙皆寓温州，每大礼率遣官分诣，至是，已迎奉神主于新太庙”¹⁵⁾。因此，绍兴四年应是对礼祭器大量需求的一年。但由于国家仍处未安之时，要立窑大规模烧造，特别是工序繁复的产品，应不是简单的事。

在恢复旧观的同时，高宗亦不忘抵御金军，虽然情势不利，几已被逼谈判媾和，但在临安仍积极准备率领六军与金军应战。¹⁶⁾于是在绍兴四年十月，奉着祖先的神位，再度由临安出发往平江行宫¹⁷⁾，在平江只度过一个冬天，第四度回到临安，¹⁸⁾这次回到临安，进一步地完善礼制所需，在绍兴五年（1135）立四祖庙，并即庙行礼。祭祀行礼在逐年恢复旧观，这一时期，为皇朝应具的祭祀规模打下基础。在临安虽然建了太庙，又

盖了四祖庙，但神主却仍随着皇帝的移动而移动，绍兴五年太常少卿张铎奉迎神主自温州至临安¹⁹⁾，接着随高宗出临安，绍兴六年（1136）九月再度由临安往平江去。²⁰⁾在平江只停留半年，又往建康走。²¹⁾绍兴七年（1137）时到建康，载神主以行，在建康也立了太庙。

在战事未息的情况下，居亦不安，众多的大臣又各有主张，有的主张长留建康，有的主张再回平江²²⁾。如此与敌周旋，战况胶着，无所定从，来回奔波于建康、平江及浙江境内，所停留时间最长不满二年，短则数月而已。

北宋亡后，高宗一路往南走，整整十年，席裕未暖，即须点点转移。情势与经验的集结，终于采纳赵鼎的建议回蹕临安。在回临安之前，应太常博士黄积厚之请，拨田亩营建先农坛，这是以农立国，精神所寄之处。营建先农殿之意义在养于斯，更确立了在临安长期驻蹕的决心²³⁾。建了先农殿，其后，一直到绍兴十六年（1146）正月，在杭州经营一段时间后高宗才亲飨于先农殿²⁴⁾。从此才真正开始积极建设临安，并“内修政事，缮治甲兵，以定基业”。

二 国家基本机构的升级及扩充

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与金签订“绍兴和议”之后，情势转缓和，稍可喘息，因此将绍兴三年所设置的基本行政机构加以充实并扩大。军器监、将作监在十一年时始置丞、长贰员²⁵⁾。此时进入较大规模的运作，绍兴十二年（1142），兴建大内文德殿、紫宸殿、明堂殿等建筑²⁶⁾，同年始诏临安府于城内择地，依制度建筑太稷坛、高禘坛，宗室的玉牒所也始建局²⁷⁾。扩大了这些机构建筑之同时，对于所需的人才也积极培养，于是“诏礼部讨论太学养士法，仍令临安府权于府学，措置增广。岁置祭酒、司业、博士、正录，定养士额”。绍兴十四年（1144）皇帝便幸太学首善阁对学子们以示鼓励²⁸⁾，其后，淳熙、嘉泰、宝庆、淳祐、咸淳年间，皇帝也都曾幸太学。²⁹⁾

这些太学养士措置增广，得以培养人才，使得南来的皇朝基业逐渐稳固。人才培养，为官僚体系所用，士人进入官僚体系（也是家族组织中），成为“宗子”的重要人选，“宗子”的任务之一便是祭祀。

三 南宋皇室与“宗子”的职责

帝王国家对于皇室宗族都有其保护与管理的制度与方法。宋朝对于皇室宗族成员的管理，亦有其制度。宋朝皇子不直接封亲王，皇子出生后，往往要有几次的更名及授予不同的官阶后，再将其中一位封为皇太子，之后再成为皇帝，如高宗赵构初授定武军节

度使，后为检校大尉，封蜀国公，再封广平王，进而封康王。孝宗初为和州防御使，赐名媛，加检校少保，封普安郡王，更名玮。其后的皇帝亦类同。不同的更名及授予，有不同的官阶，其食俸亦不同。

在血统上，皇族之子分大宗小宗，“天子之元子为大宗，以继太祖，……诸侯之元子又为一国之大宗，以继太祖，则别子为大夫者，又各为一家之祖，而不得祧其先君。继别者亦谓之大宗，所以别小宗。大夫之次子曰贰宗，所以副小宗，或同姓而异氏。或别氏而合族也。……有通称为后，而不与适适相承者，同服也。有宗庙之事，则尸主列于太室”³⁰。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宣祖、太祖、太宗之子皆择其后一人为宗，令世世封公，补环卫之官，以奉祭祀，不以服尽，故杀其恩礼。祖宗袒免亲未赐名者，年十五与请受”³¹。对于这些皇子皇孙的照顾有其规定与组织。诸如：“宗室年五岁则官为廩给”³²，“环卫官，无定额，无职事，皆命宗室为之”³³。朱熹把节度使、观察使一类的环卫官叫做“闲称呼”。“近事诸皇族鲜出补外官，悉留京师，亦不厘务，为选儒学官切磋讲习外，奉朝请而已，以朝廷亲亲之义，敦睦纠合，所以别于庶姓不责以事”³⁴等等。皇族之大宗、小宗只要有名分，祭祀便是其重要职责之一。北宋时，“不属宗室弟子以吏事，悉留京师以奉朝请”³⁵，所谓南班宗室，是在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宗室子孙初授官一律改为南班官。由以上情形可以看出这些宋朝皇室子弟，出生后便支俸，不任官，不赋予权，聚集在首府之地，祭祀，遵守祖宗旧法。南宋虽略有改变，但并无多大不同。由如此的背景来看，也就是南宋官窑器出土范围都在首城之内的原因。

国家基本机构的升级及扩充需要先培养人才，对于皇室宗室子弟积极授予就学，到了南宋逐渐改变。在《咸淳临安志》一书“宗学立教堂”中记有：“惟宗庠分职与胄监两学略同，而所以任职者，则异群天下之士，教育于两学，而拔其行能之尤者为之领袖，其律人也一于义。若夫宗庠则负笈来游皆同姓之秀，而列职以率先之，亦同姓之英也。非我兄弟伯叔之懿，亲亲相与，虽以义纠正，而实主乎恩。”³⁶在立太学之前，只有宫学。北宋置有诸王宫大小学，宅宅各有学，学皆有官。在中兴初立了礼部贡院，“诏诸郡贡士类试于各路转运所在州，绍兴五年六月十五日始集于大宗伯”³⁷。让宗室弟子能进学备德，这是自北宋以来对于宗室弟子的主张。绍兴四年时，始置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各一员，专以训迪南班子弟。直到宁宗嘉定九年（1216）才改宫学为宗学。³⁸宗子好学者颇多，但是，自北宋初规定宗室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而且不派任地方官。神宗熙宁二年时曾令五服以外宗室远亲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差遣（即实职），³⁹自此开始是宋代宗室制度一个重大的变化。南宋宗室以科举登科者，绍兴十八年（1148）为十七人。⁴⁰

皇室到了南宋代代繁衍，成员越来越庞大，对于这些成员，除了设置学官以让他们

学习进修之外，首要任务仍然以奉朝请而已。⁴¹⁾由上述的情形来看，宋皇室的支俸与祭祀费用便是国家的一大支出，“宋代财政的四大拖累是养兵、宗俸、冗官、郊贲。其中，宗俸、郊贲是属于皇族费用”⁴²⁾。将越增越多的皇族只限闲住在京师内，表示皇帝对族人的照顾，最主要的动机在于全面控制与掌握，以免日后难以处理。另一方面，国家的财政也须有足够的收入数目，否则皇室子弟的宗俸、郊贲，就会受到影响及变质。所以，此种情形之下皇室所需之礼祭器的数量，应是越来越多。

四 养士以储备人才

除了皇族就学之外，经由科举选拔的人才，一部分进用，另为储备之人才，以制定礼祭制度。贡士、进士考试分年逐渐建立，经过了一些调整，逐渐上轨道，“按系年录绍兴九年（1139）十二月御史中丞廖刚言，国朝三岁一举，士率用，今年大礼，明年科场，又明年省试。诚经远之计，今明年当试进士，复与大礼相妨。”⁴³⁾

培养有学识的人才成为定制之后，绍兴九年，以文治国的宋朝，开始镂版印书，使文人能得到最重要的工具——书本。让诸道郡学取旧监本镂刻颁行，虽然有很多残缺，但亦可供文人的需要。养士取才得以顺利推展，到了绍兴十四年确立取士制度，其后，绍兴二十一年（1151）内旨谕辅臣殿本补阙，虽重有所费，不惜也，由是经籍复全。经籍刻印事业随着南宋政局的安稳，日益繁盛，也因此使南宋版经籍至今有所存留。南宋的刻版事业，承续了北宋。在此顺便提及刻版事业的兴盛与瓷器刻花装饰的关系。北宋刻版事业的兴盛也影响到瓷器的刻花装饰，诸如定窑、介休窑、耀州窑、景德镇等，越窑则在五代已流行刻花装饰，而南宋时主要流行印花。龙泉窑刻花装饰盛行，一直到明朝都相当常见。这种瓷器上的刻花装饰，在汝窑器上则所见不多，在南宋的官窑器上亦如此。这两个窑都属于重塑型不重刻饰，因此在造型及线条上显得特别出色。至于台北故宫旧藏的两件刻花南宋官窑器，一件为莲花式盘，釉不厚，其盘内刻有一枝莲花，以半刀泥刻，简洁生动，犹如定窑的刻画手法，但较简略。此件莲花式盘较特殊，与乌龟山万松岭的产品有所不同，釉薄，半刀泥刻刻画，器壁圆弧度柔和，与厚釉的官窑不同，应是一种类型的指标，或是为厚釉官窑器出现之前的类型。另有一件单线刻龙纹的镶铜口盘，应是早期口缘破损，因而以铜镶口，此件釉较厚，釉质与乌龟山较类同。但是盘之圈足较低，而龙之眼珠点得深，且呈深褐色，这可能是因胎土带铁分重而反映出来的，不是特意点染的，因为褐色点没有晕散的现象。至于单线刻划纹饰之类的器皿，在至今发现的窑址中尚未得见。上述的这些产品在制作上都是常态生产，应有其窑址的存在。

五 仕途、官僚与“宗子”制度

皇室有宗子的组织，一般社会家族亦有“宗子”制度，以“大宗”或“小宗”来分家族的枝叶。一宗的族长“常常选立官僚地主为宗子（族长），形成以官僚地主为核心的宗族势力。宗子的选出多从地位、财力、才能等方面考虑，选立本族地位、财力、能力等最高的官僚地主，由士人来当宗子，继承一家的祭祀。这一新标准透露出，宋代地主阶级所要建立的新的家族组织是以‘仕宦’即官僚地主为核心力量，受到官僚地主的控制，其根本目的是要保证各个官僚地主家庭能够传宗接代、永世不绝，并且借此来巩固宋朝的统治。”⁴⁴⁾

“宋代的家族组织以祠堂作为全族祭祀祖先、举行重要典礼、宣布重要决定等活动的中心。……北宋时，已经出现了一些‘祠堂’。……宋代家族组织建立祠堂，把它作为全族的活动中心，应该说是从朱熹、陆九渊等人的提倡开始的。……由宗子主持，子孙不得据为己有。祠堂内设四龛，供奉高祖以下先世神主。……《朱子家礼》卷一，《通礼·祠堂》还规定了祠堂内设祭器以及祭祀的仪式、服装等。”⁴⁵⁾一般士人家则以“台棹享祀类，几筵乃是凶祭，其四仲吉祭，当用平面毡条屏风而已”⁴⁶⁾。因此，皇族、士人，大宗、小宗所重视的是祭祀，都需要依照礼制举行祭祀。正如中国民间社会现存的宗亲会，同姓者虽有支系之不同，但仍视为宗亲而组成宗亲会。

六 祭祀仪礼逐渐恢复旧观，祭器以“陶木代之”

原本信奉道教的宋皇朝，对于祖先神祇的祭祀非常重视，绍兴十三年（1143），逐渐开始有充裕的精神与物质来恢复北宋时祭祀的旧观。这一年，礼部太常寺修立郊祀，九宫贵神坛的祭礼，景灵宫的奉祖宗衣冠行礼，在郊坛之侧建青城斋宫。郊坛的祭祀，历朝都很重视。宋朝的祭祀，祀上帝、春、夏、秋、冬祭礼及郊坛等都是国朝祀典。此年十一月以元祐郊礼合祭天地，设大神、大示并乙太祖皇帝、太宗皇帝配位、并从祀诸神、凡七百七十有一。所设的祭器有九千二百有五件。卤簿万二千二百有二十人。到了绍兴二十五年（1155）郊增千人。在上文所述的绍兴四年享太庙、明堂时祭祀诸神凡七百六十七位，此时加入五位。由《咸淳临安志》明确的记载着这些数字，应是南来后较大的祭典仪式，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记载着所使用的祭器，由于偏安于江南，国力未实，只得以应变的办法，“应用铜玉者，权以陶木。卤簿应用文绣者，皆以撝代之”⁴⁷⁾。这对于新的祭器制作而言，给予一个明确的方向指示，是一项很重要的改变。

虽然上述记载着绍兴十三年十一月所设的祭器有九千二百五件，但有陶有木，应该

不全然是瓷器。漆器自战国以来，在礼祭器及生活用器上，是不可忽略的器皿之一，也是宋朝高阶层的重要器用之一，携带方便，不易破损，因此在九千二百五件中，窑器的使用应该仍然有限。所以这一年应是南宋官窑步入量产的时期。在绍兴四年，关于享明堂祭祀时的记载中，并没提及祭器数目的相关问题。南宋这个“器应用铜玉者，权以陶木”的“应用”，事实上并非创举，自战国到汉朝，以铜器、漆器为造型、纹饰的陶器常有所见。其后，唐宋时，铜漆金银器之造型、纹饰，往往借用于陶瓷器之上。

而绍兴十三年这项特别的指示，意味着绍兴四年时还没有能力以礼制上制式的祭器及数量来举行祭祀，在绍兴十一年与金“绍兴和议”后，虽然经过了二年的养精蓄锐，祭祀礼制逐渐恢复的情况下，仍未能如北宋一般，因而只得以“陶木代之”的变通办法，以充实祭祀形式上的内容。事实上，“陶木代之”的指示使南宋官窑的器形产生了特色，南宋官窑器造型常见的如尊、觚、簋、炉、波罗子、洗，以铜器阳刚的造型为取向，与北宋汝窑以漆器柔和的造型为取向有相当不同的韵味。这些都显示着绍兴十三年以后，南宋官窑的生产，有礼祭器的需要，亦有皇亲贵族生活器皿使用上的需要，正是一个开始罚展的重要年分。

七 祭祀的繁多，设立祭器屋、祭器库

之后，绍兴十三、十四年时，除了对神祇、祖先祈福等诸多的祭祀外，因崇信道教也开始兴建道教宫观，九宫贵神坛、景灵宫，及由慈宁殿斥费建四圣延祥观，祭拜天蓬、天猷、翊圣、真武，⁴⁸⁾其后，宫观逐渐增加。⁴⁹⁾宋朝皇帝皆以孝为重，尊其嗣承，高宗在太庙重新厘定礼制后，循东都旧制，建钦先思孝殿，以奉祖宗神御。⁵⁰⁾

循东都旧制，在东京时天章阁为奉列圣御容之处，则到了绍兴二十四年（1154）始讨论制度重建天章一阁⁵¹⁾。绍兴十六年建了佑圣观⁵²⁾。这一年对于太庙的礼祭器做了考证与厘正，应是礼数增隆，祭器增多，因而使得室隘不可陈列，于是请增建庙宇，同时做了一项重要的措施，即是增建祭器屋。这表示祭器已增加到相当数量，需要有受容存放处，并且以制度管理，除了太庙之外，在东庑宝库亦设有收藏祭器的库房。东庑宝库储存的祭器是否有金石材质的分，并无记载⁵³⁾。收藏祭器“库房”的增建，表示国家进入安定与充裕时期。在绍兴二十三年（1153）设左藏库，其东藏币帛绳紬之属，其西藏金银泉券丝纩之属。⁵⁴⁾东庑宝库的设置时间应在太庙祭器屋与左藏库之间的时段内。绍兴十七至二十年祭祀、宗教活动愈来愈频繁。高宗亲祠高禩坛，增建九宫贵神坛之坛，建万寿观以奉皇帝元命殿，太乙宫设有宝室皇帝本命殿，显应观因靖康间高宗皇帝出使磁州，神马引而南，⁵⁵⁾灵寿观奉徽宗皇帝等北宋皇帝御画之处。

道观的设立，在南宋高宗时已建立了一些，其后的皇帝及后妃也循其道，为求现实